

南社小说研究

NAN SHE XIAO SHUO
YAN JIU
CHU TAN

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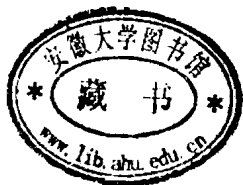
姜国一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南社小说研究

· 初探

姜 国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社小说研究·初探 / 姜国著.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601 - 8461 - 6

I. ①南… II. ①姜… III. ①南社 - 小说研究 IV.
①I20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9082 号

书 名: 南社小说研究·初探

作 者: 姜国 著

责任编辑: 刘子贵 责任校对: 高珊珊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5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8461 - 6

封面设计: 刘瑜

长春市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

2012 年 6 月 第 1 版

2012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序

南社是诗的王国，同样也是小说的国度，只不过它处在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夹缝中，没有明清小说至臻完美，也没有现代小说预存现代性的刚烈。它们的主题又被定格在充满暧昧甚至靡靡之音的言情系列，在遭到五四小说界猛烈批判后，被扔进文化的冷宫，历史的尘埃又将其封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人遗忘。时值今天，南社百年纪念已过去，人们依然在争论着南社的是是非非，崇仰着南社诗歌革命的功绩，唯独小说，还处在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提及它，是因为南社的小说成就，代表了民国初年小说领域的成就。这一点是过去所没有认识到的。

民国成立以后，南社社员们几乎掌握了上海的几家大报的编辑大权，如《民立报》、《民权报》、《天铎报》、《太平洋报》、《民国新闻》、《中华民报》、《生活日报》等，直到1916年，叶楚伦和邵力子创办《民国日报》，那更是南社人物的大本营。在这些报纸的副刊上，主要就是以诗歌和小说为主。虽然1913年前后，一些报纸被袁世凯政府查禁停刊，但是南社作家又转而办杂志，如《民声丛刊》、《春声》、《七襄》、《民权素》等，仍然有发表小说的场地。因此，南社小说家在这个时期显得比较活跃，小说作品发表得比较多。1917年还专门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南社小说集》，在它的《跋》中还提出了南社小说家的创作宗旨是“开通风气，棒喝社会”。可惜的是，仅出了一期，就由于南社内部的纷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等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南社的小说创作逐渐显出了弱化的趋势，最后为鸳鸯蝴蝶派完全取代。

研究南社的小说，首先应当从它的三位发起人谈起。但是，这三位发起人都是典型的诗人，不仅在小说创作上毫无建树，而且，压根儿就没有兴趣。因此，我们不得不转换视角，从最早进行小说创作的叶楚伦谈起。叶楚伦是南社最大的小说家，也是真正的小说家。他进行小说的创作时间最早，创作延续的时间最长，创作的品类最全，创作的数量最多，创作的成就也最高。1908年，刚刚二十岁，还在中学堂里读书的叶楚伦，就写成了第一部小说《新儿女英雄》。那是有感于秋瑾惨遭清吏的杀害，而为革命者树碑立传的作品。小说中用一条暗线来描写革命者的活动，而把主线让给了一个儿女情长的故事。小说虽很幼稚，却显露了作者的才华。1911年，叶楚伦的另一部小说《破碎江

山》问世。叶楚伦的成名之作是《古戍寒笳记》，始刊于1914年。这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描写三百年前明末清初的社会风貌。《破碎江山》写的是上层社会的腐化生活，而《古戍寒笳记》写的却是民间的抗清活动。小说描写了江南、塞北、关外三处抗清斗争的业绩。其中灵芝老人和停云女士二人的事迹，论者以为，实乃小凤之先祖叶绍袁和祖姑叶小鸾的影子。书中对寡廉鲜耻的汉奸的描写也十分出色。叶楚伦另一部受欢迎的小说是《如此京华》，始刊于1915年。这是一部揭露袁世凯政府的黑暗统治的小说。江南人戚少甫投靠他的堂舅袁记政府的财政部长刘其光，以此为线索，展开了袁世凯称帝前后北京官场种种黑暗的描写。垂着辫子的清朝遗老，身着洋服的民国新进，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又互相倾轧。吹牛拍马，投机钻营，无所不用其极。娼寮妓院，声色犬马，蝇营狗苟，龌龊不堪。好端端的一个清平世界，被这班人搅得乌烟瘴气。书中还特别揭露了袁世凯为登上皇帝的宝座，煞费苦心制造了一些丑剧、闹剧。作者无情地嘲弄了这批做着皇帝梦、封侯梦的无耻之徒。作者着手写作时，袁世凯政府还掌握着生杀之大权，严密控制着各个部门。作者敢于运用小说的形式，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揭露，并把矛头直接指向袁世凯政府，表现了作者非凡的胆识。《蒙边鸣筑记》是叶楚伦的另一部小说，刊于1916年。书中描写了活跃在东北地区的草莽英雄铁鹞王、阿髯、爱国志士江南生等人的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出现了一位朝鲜爱国志士女侠李朝阳。她和中国志士互相配合，并肩战斗，一起歼除了正在盗窃我国情报的日本间谍。这部小说情节曲折，描写人物和事件，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处、略具惊险的特性。人物形象也较为鲜明，如足智多谋的铁鹞王，粗犷鲁莽的阿髯，凛然正气的江南生，以及侠肝义胆的李朝阳等。就是反面人物，如日本特务、汉奸、朝奸等，作者也都没有放过对他们狠毒、狡诈、卑鄙无耻的个性的揭露。但是，这部书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用了文言来写作，通篇显得板滞，描写人物性格时，未免有些扞格之处，使人见不到叶小凤那种轻松活泼而又俏皮的文风了。

叶楚伦还是一位擅长写短篇故事的小说作家。浅近的文言，曲折离奇的故事，波澜起伏的情节，出人意料的结局，使叶楚伦的短篇小说在民国初年享有它自己独特的地位。这些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生活际遇。有的是奇言异行，形同痴呆实为钟情的《贾宝玉》；有一生提笔为文，戏弄女性，终于在梦中受到女性报复的《诲淫小说家》；有似不解世事的痴女子四儿的婚事《塔溪歌》；有以情玩世被人称为圣之淫者的倡门女子、终于得到真情的《张五宝》；还有丑女以艳貌美容而被选为王妃的《疯十八姬》；有以调情戏弄太守和富绅于席上的清高自洁的《男尼》；有贫为卖花女

而属意于高傲名士、一朝歌会乃随之而去的《卖花女郎》；有夜遇女郎而缔婚姻，又为所戏的《蒲留仙孽缘》；有贤妻协助穷书生丈夫得以建功立业，而竟弃发妻另寻新欢的《常无咎》等。在当时来说，都是独具一格的。叶楚伦的小说在民国初年是很有影响的。他熔新旧形式于一炉、烩文言与白话为一体，选材则出入现代与历史之间。研究中国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不能不研究叶楚伦；研究旧式小说向新式小说的过渡，也不能不研究叶楚伦。“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叶楚伦很快地站到时代的潮流之中，写出了一大批反映新时代的小说，叶楚伦是一位随时代的潮流而前进的人物。

包天笑，可以说是南社小说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包天笑写小说的经历，是从翻译外国小说起步的。最早是和杨紫合译的《迦因小传》，后来是《空谷兰》和《梅花落》。他几乎和鲁迅同时翻译了美国科幻小说《造人术》。他创作的小说，是1907年的《碧血幕》，那是以秋瑾事件为题材的。因为未完而影响不大。使包天笑最负盛名的是他翻译的三部小说，而且都是教育小说。这在民国初年，于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五大类型之外，别树一帜，并因此而获得了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奖赏。研究包天笑的教育小说，首先要提到的是《馨儿就学记》，发表于1909年，原书是意大利作家亚美契斯的长篇小说《爱的教育》。包天笑采取的是意译的方法，他把整个故事都中国化了，故事背景也移到了中国，人名，地名，风俗习惯，生活起居，时间历法，一切都是中国本土的，而且某些章节竟完全是译者的创作。书中的人物有杨先生、小学生馨儿、张公霖等，通过他们教育和接受教育的过程，宣扬了民主教育思想，教导学生要奋发有为，以便“起我衰敝之祖国”。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书中充满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黑暗的中国社会，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包天笑译述的第二部小说是《埋石弃石记》，刊于1911年。原著为日文，描写的是一位村镇的小学教师沈宝铃，爱校爱生，在艰苦的生活中，耐心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培养青少年养成完美的人格，使他们长大成材。书中由筑堤坝开始，向水中弃石埋石，以打下坚固的基础。基础固，“则国家之基础乌有不坚乎！”则是很早就认识到了教育兴国的道理。

包天笑译述的第三部小说是《苦儿流浪记》，刊于1915年。原作为法国小说。描写的是：法国街头发现一个弃婴，后被一农妇收养。婴儿长大后受到良好的教育。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知道了自己是英国人，从小被人偷到了法国，便萌动了寻找母亲的念头。中间经过了种种苦难与波折，终于到了英国，找到了自己生身之母，和家庭团圆。后来他又继承了遗产，并且找到一位意中人，婚后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小说强调的是，人要经历磨难与挫折，

要经过努力和奋斗，要有毅力和决心，要从小就在性格上加以培养，使他们能在逆境中成长。包天笑也写过社会小说，1909年发表的《一缕麻》便是一篇奇特的小说。新婚的妻子得了白喉，痴呆丑陋的丈夫不避传染，昼夜侍奉。妻子病愈了，丈夫却不幸感染而亡。妻子有感于丈夫的深情，誓不再嫁。这篇小说宣扬的是一种新的道德观，以情报情。这种无情向有情的转化，和封建社会的守节应当是有区别的。《一缕麻》写一颗纯真高尚的心，一种发自内心的、由尊敬而产生的爱，这种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爱，拒绝了外来的诱惑，凝固成了专一的爱。难怪它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收到了意外的效果。

与包天笑有着类似经历的南社小说家——周瘦鹃，是以写短篇小说而闻名于世的。就是他的译著，曾经受到鲁迅特别表扬过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也是短篇小说的结集。周瘦鹃小说的特点是突出的爱国情感，其中以写于前期的《行再相见》最为有意义。少女华桂芳和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秘书相爱，正在热恋中的她，听伯父的介绍，得知男友正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杀害她父亲的凶手。情人顿时成了仇人。伯父要求她去杀死男友，“你知道，你是中国人！”出于家恨国仇的正义感，华桂芳果然在第二天赴约时在咖啡里下了毒药，亲手杀死了仇人，正义战胜了私情。写于1915年的《亡国奴日记》，是为反对“二十一条”而精心结撰的一篇小说。全书用日记体裁，叙述了“我”沦为亡国奴，受尽了外国资本家的折磨和奴役，因为不堪忍受，于是起而抗争，在冲突中打死了占领者，只身逃到大洋之中一个孤岛之上，继续顽强地生存下去。日记中记下了“我”的奋斗经历，“俾使后之览者，洞知天下亡国之苦，而各个爱其家国也。”这篇小说不仅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四年之后，在“五四”运动“还我青岛”的浪潮中，他再次把此书单印成册，广为散发，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周瘦鹃的这种爱国热情，还表现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1921年写的《双十节之哀音》，第二年写的《新年好梦》，以及《中华民国之魂》、《祖国重也》、《为国牺牲》等等。如果把他翻译的爱国小说加在一起，数量就会更多一些，如《爱国少年传》、《爱夫与爱国》、《情人坎，祖国坎！》等等。

周瘦鹃又是一位善于写爱情题材的小说作家。他的爱情小说的特点是多写悲剧的结局，被人称为“哀情小说巨子”。其中著名的有：《恨不相逢未嫁时》、《此恨绵绵无绝期》、《遥指红楼是妾家》以及《临去秋波》、《阿郎安在》等。这些小说注重的是一个“情”字。歌颂的是青年男女们的真诚相爱，更多的是写出他们的不幸。小说的结局往往是有爱而不能成为眷属。究其原因，自然是强大的封建道德在从中作梗，父母之命，门第观念，金钱势力，

并不因为民国的成立而自动消失。于是炽烈的爱情便化为冰冷的哀情，辛酸的眼泪，痛苦的别离，自然形成了对封建礼教的控诉。此外，周瘦鹃还有几篇描写工人生活的小说，如《檐下》、《脚》、《血》等，对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可惜的是，在总体上份量少一些。

南社的另一位著名小说家是苏曼殊。因为他的特殊的身世，曾引起过很多人的关切与同情，而以他个人身世为内容、以他个人为模特儿的小说，就更能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他的译著《惨社会》，本来是一部翻译小说，原作者是法国的大文豪雨果。苏曼殊在翻译时，不仅随意删节原著，而且还大量增入自己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些看法。更有意思的是，从第七回起，他便离开了原书的整体结构，衍生出来一段新的情节，加进了一个新的人物男德。他不仅对孔子大加嘲弄，而且还把矛头直指清朝政府，称之为猪狗，表现出了强烈的革命倾向。因此，人们认为《惨社会》的后半部，实际应当是苏曼殊创作的小说。从1911年到1916年，连续六年间，苏曼殊共发表了六篇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在这“六记”中，苏曼殊很少写那种卿卿我我，朝朝暮暮，相悦相恋，分拆不开的镜头。相反，他总是选取那种一见即别，两地相思，千里相等，未见即亡的情节，以表现爱情的纯真、深挚。苏曼殊还非常注意这种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封建社会中的门第观念，贫富之别，金钱往往是左右婚姻的主要因素。因此，他总是在小说中揭出这横亘在青年男女之间的障碍，对其进行无情的鞭挞。

说到南社的小说家，不能不提到徐枕亚。他是民国初年享誉海内外的—位小说大家。一本《玉梨魂》不知使多少青年男女为之倾倒。这本书的出版，所引起的轰动是空前的。发行量之大，再版次数之多，是民国初年任何一本书也无法比拟的。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特殊的是，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位寡妇。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封建礼教还根深蒂固，寡妇还没有再嫁的权利。他们只好诗词唱和，书柬往来，竟至深夜约会。但也就在爱得最浓烈的时候，却戛然而止，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女方以小姑自代，以割舍男方对自己的情缘，但小姑却无法获得男方的真情，便抑郁而死。男方也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却仍然不能释怀。女方也因此郁郁而亡。男方在极度悲愤之中远走日本，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他在异国他乡，因为国弱受人欺的感染，爱国之情勃然而发。正值国内爆发武昌起义，激于爱国热情，他便束装归国赶赴前线。在一次战斗中，手毙敌兵之后，壮烈殉国。如上所述，这部小说的总体构思是好的，它把爱情和爱国这两大主题统一起来，在民国初年，自然是符合读者的口味的。其次，这部小说写爱情，爱得真挚，也爱得纯洁；爱得热烈，

也爱得冷静。爱情的结局是悲剧的，爱国的结局却是悲壮的。这是一部成功的小说，其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都是应当肯定的。徐枕亚在这个时期还写过一些其他小说，如《双鬟记》、《余之妻》、《刻骨相思记》，以及由《玉梨魂》改写的《雪鸿泪史》等，但却无法与《玉梨魂》比肩。

除了上述的几位小说家之外，还有写《玉环外史》、《孤臣碧血记》、《恨海鹃声谱》、《姊妹花》的王无生；写《逐日演义》、《倒乱春秋》、《痴人梦》、《女蛾记》的谈善吾；写《玉田恨史》、《泪珠缘》的陈蝶仙；写《燕蹴筝弦录》、《风芙蓉记》、《春奩艳影》、《恨海孤舟记》的姚鹓雏；写《弱女飘零记》、《春水沉冤记》、《孤雏劫》的胡寄尘，以及程善之，朱鸳雏、闻野鹤、姜可生等人，这就构成了南社小说家群这一特殊现象。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特别指出，上面提到的几位南社小说家，后来都是鸳鸯蝴蝶派中的人物，而且被认为是中坚分子或骨干力量，其中尤以徐枕亚最为著名，被认为是鸳鸯派的开山祖师。包天笑和周瘦鹃则被认为是鸳鸯派的两位主将。叶楚伦也被人们拉进了鸳鸯派的阵容里。还有苏曼殊，这位身世孤苦的行脚僧，虽然不在鸳鸯队里，蝴蝶丛中，但有的论者认为，他的小说对鸳鸯派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难怪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是南社的小说家都堕入了鸳鸯派的泥坑，或者说，鸳鸯派的小说家都混入了南社的队伍。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南社小说家和鸳鸯派小说家之间，在民国初期，确实存在着通融的现象，或者说有同一性。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晚清小说中的几大类，如政治小说，已经处于低潮，那种鼓吹反清的小说显然已经过时，随着民国的建立，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侦探小说中的福尔摩斯已为人们熟知，不再有新的神通。而中国的侦探小说还没有诞生。武侠小说当时还未大量出现，人们在品味共和滋味的时候，一时还想不到要侠客出来救世，打抱不平。科幻小说尤其不吃香，科学技术当时还未能提到日程上来。黑幕小说还未形成基础。而读林译小说的高峰也已经过去。因此，盛行于文坛之上的，就只有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两种。因为这两种小说形式能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及时地激发起人们的思想感情。所以，民国初年最叫座的两大小说便是属于言情小说系列的《玉梨魂》和属于社会小说系列的《广陵潮》。而南社小说家们所擅长的，也就是这两类小说。因此，当日后鸳鸯派小说大量涌起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小说史，把南社小说作家和鸳鸯派小说家之间划上等号，就是必然的事了。不过，鸳鸯派小说在过去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不好的文学流派，现代文学史称之为“新小说的反动”，或“新小说的逆流”。其实，对鸳鸯派小说的分析与考察是很不全面的，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也是很科学的，因而评价也是不公平的。从上面的分析中

可以看出，这一派中的不少作家都写过比较优秀的作品，就是一些过去被非议的作品，今天看来，也并非一无是处。不要一提到鸳鸯派，就是糟透了，坏透了。如上所述，把它们放在南社的小说这个框架下面做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我想，会有新的认识，会作出新的评价的。

郭长海

辛卯年乙亥于京寓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时代与叙事——南社由诗文到小说创作的转变	9
第二章 异化与归化——南社的翻译小说	41
第三章 醒世与革命——南社小说的爱国观	62
第四章 觉世与规避——南社小说的爱情观	76
第五章 讽世与变革——南社小说的社会观	95
第六章 社团与流派——南社小说家与鸳鸯蝴蝶派	116
结 语	130
附录一 南社小说作者名号表(笔名查本名)	133
附录二 南社小说目录	141
参考文献	236
后记	239

引言

在传统中变迁，在孕育中走向现代，是晚清民初中国文学史转型时期的基本特征。中国文学创作的转型与突破的显性标识，是晚清民初新型小说的崛起。如果说五四文学的显赫地位来自新文学家站在宏大的历史潮流中用身体的书写来为新时代的到来摇旗呐喊，那么，他们的先遣则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一群处于转型时期被湮没了的士大夫，尤其是以南社社员为代表的民初小说家。这些小说家，是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拓荒者。南社小说家的创作与理论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步履，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地位。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南社小说家在新旧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时常陷入世俗与情感激烈冲突的矛盾泥沼，暴露出他们无可奈何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内在的困境与危机，最终被五四新文学所扬弃。但如果没有南社社员为代表的民初小说家的开拓之功，五四文学的发生则会显得非常颓然，发展得如此顺利让我们感到困惑与迷茫。

南社作为一个民间的文人群体，他们紧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对中西文化交融是持积极态度的。尤其在小说创作上，他们提倡新小说，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在自己创办或主编的报刊上登载创作小说与译作西方小说。南社人物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同时，注意吸取西方文化并将其融汇于自己的创作，推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呈现出开放性，蕴涵了现代的气息。

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太后下诏书，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始废除科举。这一政治举措如一枚炸弹，在中国文人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打破了他们“金榜题名”的人生终极梦想。传统的儒家文化在西学东进的撞击下发生了错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名士生活面临着重新的选择。列强的炮火摧毁了士人规避政治、追求陶渊明式归隐生活的空间。文学创作成为末路名士消解胸中块垒、解脱贫困的必由之路，这也是清末民初文坛兴盛的宏观背景。一切作品总是产生于它的历史环境之中，并参与它周围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历史之中，把握一部作品，也可以在一部作品中，把握

一段历史。^①

南社先贤们在接受西方新思想的同时，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还在传统儒道思想上徘徊，以传统文化涵养的传统人格来应对中国现代化的责任。时代的绝望与悲哀，只能在浴火之后涅槃重生。宏扬国粹，砥砺志节，来恢复这个古老帝国的辉煌，来面对这个已经彻底改版的世界。他们首先要承担的是在一个没落的文明古国进行革命的艰难任务，外围的限制、环境的险恶、革命的挫折，传统文人的人格、社会属性与现代使命之间的磨合和冲突超越了他们的负荷能力。曼殊的颓废厌世，可视为对这个黑暗时代的一种消极的抗议。用他浪漫的个性来拯救他陈腐的思想，个体生命在混沌中发出响彻云霄的绝唱，用灵魂的曙光，促成中国的苏醒。

文人参与政治的方式多游离于笔墨之间，借文字来揭露社会黑暗。众所周知，南社社员加入同盟会，后来参加国民革命成为民国要员的很多。这些经历改变了他们文学创作思想的根基，在时代精神的号召下，文学与政治开始结合，饮酒酬和的诗文雅集赋予了革命的气息，而小说创作也掀起了解构民族主义的话语。辛亥革命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但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民众理想中的三民主义与现实社会脱轨。袁世凯盗取革命果实，二次革命失败，刚见曙光的中国社会又沉沦于黑暗之中。民主革命转入低潮，陈蝶仙的《新官场现形记》应运而生，以官场禁烟赌、省开支收、发派公役、巧设办公厅、自治办公室等等各种打着民主共和旗号的丑相层出不穷，揭露鱼肉百姓、榨取民脂民膏成为百官之本。许指严的《京华新梦记》、《三海秘录》、《南巡秘记》，贡少芹的《胭脂井外史》、《西后犬》、《袁世凯轶事》、《袁世凯轶事续录》、《洪宪宫闱秘事》、《轶事续录》等，这些作品在传播宫闱秘史的同时体现着“文学政治化”的意义。叶楚傖的《如此京华》，直接披露袁世凯政府的黑暗统治。苏曼殊在译著《惨社会》时，疏离原书的主旨，对孔子大加嘲弄，并将矛头直指清朝政府，在情节“衍生”中蕴藏着革命力量的整合。范烟桥的《新潮过渡录》是维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周瘦鹃的《亡国奴之日记》和《卖国奴之日记》于嘻笑怒骂之间痛斥了侵略者和卖国贼，表达了强烈的爱国心；姚鹓雏的《龙人套语》（后更名《江左十年目睹记》），记述了民初至北伐前北洋军阀在江南的残暴统治，是集谴责与批判为一体的社会小说。南社小说家继承晚清的谴责小说对时代的抨击入木三分极尽讽喻之能事的笔法，在文学实践上印证了晚清“文学政治化”的转向。

^①卢文芸：《爱情、死亡与革命——论苏曼殊小说及其他》，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清末小说界革命过分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导致小说自身的艺术特征被湮没，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政治的附庸。以南社小说为代表的民初小说虽标榜消闲游戏的趣味主义与写情主义，其小说观念似乎在回归传统，藉此来否定晚清政治小说观念，实旨却把小说推向世俗、社会的纪实，最终导致言情小说盛极一时的局面。南社小说观念的调整直接引发了小说创作题材的转换，使其更接近了小说这种俗文学艺术的本性。南社的社会小说改变了晚清小说倾向政界官场的讽刺艺术，转向现代化都市与落后的乡村，形成社会的两级，为“五四”小说新潮的崛起作了铺垫。南社小说家在对晚清功利小说观和政治题材小说思潮更定的过程中，受创作者自身的思想苑囿的影响，其庸俗化、世俗化、情趣化的流弊是在所难免的。南社小说家们在外来文化和时代背景影响下，更多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意识。虽然他们思想的转变带有阵痛与困惑，最终却实现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性变革，并且获得了全面的突破性的进展，成为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奠基石。

二

爱情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就唱出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情之歌。感情的纯洁，充满幻想甚至是无拘无束的表白，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的自由以及人们朴素的爱情观。随着社会的发展，礼大于情的道德思想越来越被统治者称赞，最终人性的原真形态被诞生的程朱礼学，绳束于纲常伦理之中。到了晚明，对理学的厌恶、与礼教的抗争成为时人追求人性本真的洪流，置礼于后，发乎激情。将个性与人性的激情倾注于男女之情，“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①强调爱情是个体生命力之本。礼教所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性，人性的自由发展。在封建体制的钳制下，晚明士大夫不能推翻礼教制度，只能用情来改造礼，因为情与礼的矛盾的消解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到了近代，情与礼的冲突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走向顶端，困惑的士大夫依然在追寻着突破礼教之网的良方。礼教给男女真情带来的阵痛，依旧刺激着士大夫的心灵。中国近代虽然是一个富于激情的时代，但是它的激情却未能像晚明时代那样导致作家的个性高昂，以冲破礼教的束缚。^②南社的社员说其不幸，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逃脱在困顿中挣扎的命运，但他们在不幸中又有幸运的一面，

^①冯梦龙：《冯梦龙诗文》，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页。

^②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299页。

时代赋予了他们机遇，对情对礼的图解超越了先贤。虽然没有逾越礼教的鸿沟，却开启了推翻礼教桎梏爱情的先河，成为“五四”之前打倒礼教的先驱。

在中国爱情文学发展史上，创作者是不喜欢悲剧的，远离悲剧却离不开悲剧的渲染。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发展到最后无不实现中国传统的最高理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才子佳人无论经历多么坎坷的磨难，最后一定要走向大团圆，大团圆结局后无不是悲欢离合演绎的一曲喜剧性的乐章。到了晚清民初的南社小说，这曲乐章已经赋予了新的内容。南社小说家摒弃了人们常见的大团圆式喜剧作为文章的终曲，终以悲哀之美的“寡妇恋爱”、“和尚思情”所导致的人去花黄的悲剧演绎成对礼教的责难，情在缠绵之后无不彰显着现代性的奔放、个性的自我张扬。徐枕亚的《玉梨魂》能够风靡一个时代，不仅仅是描述了当时男女自由恋爱的困惑与艰难，男女主人公在欲爱不能的情感折磨中走向悲剧，更重要的是他直接对礼教进行发难，将恋爱的主题在无形中深化。南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苏曼殊，将自己的人生融入作品。苏曼殊那些感伤的爱情小说，不再是单一的男女之情，而将社会与民族糅合在一起，凸显出道德主题和人生的价值体系。法忍、实玉这样的痴情男子，因感情受到欺骗、愚弄而采取自杀来解脱生命的困惑，这种“必期以死”结局成为爱情这个不容亵渎的理想本身的终极抉择，人类构建在这个美丽的理想之上的价值体系最终在时代的困惑下发出无奈的呻吟与阵痛。

在西方“婚姻自由”和“爱情至上”思想的影响下，南社的写情小说对男女之间的纯真爱情表现出朦胧的觉醒和向往，开始触及到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压抑与束缚的问题。“是故婚姻不自由也，重男轻女也，财产世袭也，义务教育之不知也，皆吾国与泰西特异之点。问何以异？宗法为之障也。宗法不变，则四者不革。”^①这是当时社会普遍且根本之原因，爱的至高至纯，却逃不脱甚苦甚痛的悲情。三角恋爱模式的建立，是背叛礼教的另一种规避。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虽有不少多位才子争一佳人的情节，甚至出现绣楼抛绣球的择婿手段，必将丑恶之男置其中，佳人在历经磨难后才能与才子走上婚姻的殿堂，无论怎样描述，重点都在“争”上，而“爱”和“恋”过程不再重要。到清末民初，西方人的三角恋爱经林译小说让国人大开眼界，南社小说家则将其国土化，在传统的蜕变中打破了晚清以来缺少现代意义上的三角恋爱所蕴涵的困惑和矛盾。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苏曼殊等在小说中对三角恋爱的描写，开拓了一个最为显著的领域，迈出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第一步。这种富有现代意义的描写超越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历史空间。同时，

^①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第六卷，第7号。

在这类小说中，“情”“理”“欲”三者的对立，无形中更加显示出“情”的神圣与高洁。同时，南社的写情小说，疏离了明清艳情小说淫秽色情之类的描写，他们崇尚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在洁身自好中极尽笔墨之能事，抒肺腑之激情，写情小说的价值选择不再是哀怨怜悯的个人情感的悲歌，而是转化为控诉礼教、呼唤自由和解放的时代号角，将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道德。基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束缚和时代的局限性，南社的写情小说不可能像五四文学那样充满战斗的气息，出现一批“娜拉出走”式的爱情小说。民国始肇，改变的只是封建政体的瓦解，民主共和还不能彻底根除封建余孽。现实依旧，礼教依旧，封建婚姻制度依旧在夕阳下延喘。南社小说家们虽然深感礼教对人的压抑，按他们“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①思维模式，依然突破不了礼教的防线。周瘦鹃的《恨不相逢未嫁时》中对主人公的内心矛盾中以礼自持而生的坚定和哀伤的欣赏，包笑天的《一缕麻》能够把反抗礼教和宣扬真情的思想熔铸成一个至情至性的双重悲剧故事，演绎了五四文学的先锋路程。南社小说中的主人公对恋爱过程中最大的阻碍——礼教，基本上采取的是从《诗经》就开始不断重复出现的中国传统中的经典态度：刚强而又柔弱的合一。说刚强，是因为对恋爱目标的执著，不惜以身体沉死的方式向爱情告别；说柔弱，是因为对礼教的无奈与承受，最终栖于悲剧的圈套里。这些小说大都来自作家自身体验，他们都有过追求爱情自由，在社会和礼教的双重镇压下，以一生的抑郁结束曾经绽放的爱情之花。他们没有勇气挣脱缠绕在身上的封建礼教的丝绳，试图依靠这样的社会将爱情纳入礼教行列并在此寻觅一寸藏身之地的梦想的存在，注定了他们所幻想的一切都以阵痛的结局拉上人生的帷幕。

三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换进程的必要一环即小说观念的调整为民初小说题材的转变提供了契机，而清末至民初外国小说的大量输入则促进了民初小说在叙事模式方面的转变。民国建立前后，随着对外国小说技法的进一步了解和消化、吸收，小说家们陆续推出了一批在形式上有较大突破的小说新作，对中国小说传统模式给予了更有力的冲击。

日记体小说的出现是第一人称叙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尽管中国文人记日记的习惯可追溯到唐宋，但因其“随手札记”与“逐日记述”而没有成为

^①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391页。

独立的叙述体裁。中国日记体小说的诞生，应归功于异域日记文本的介入。自1899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茶花女临终前数页日记的译写开始，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日记体进入中国现代小说领域，并衍生成一种文体即日记体。如果说徐枕亚在《玉梨魂》的结尾引录绮倩的临终日记是在模仿林纾译《茶花女》，那么，他的《雪鸿泪史》则全然启用了日记体的形式，完成了对《玉梨魂》日记体的重写。引入大量日记、书信，成为南社小说家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段。周瘦鹃创作的《花开花落》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十六日断续地记载了十五天的事情，已是一篇完整的日记体短篇小说，《断肠日记》以娴熟的艺术笔触完成了日记体小说创作。《雪鸿泪史》和《亡国奴日记》在发挥日记体小说擅长的人物内在心理世界的凸视上和个人情感的倾泻上，已显现作为新文体的优势。南社日记体小说的感情倾向和倾诉笔调，以清末民初一种普遍的人性原生态为依据，传达出一代人觉醒时的心灵的呼唤，在张扬浓郁的时代色彩的同时，重塑着抒情之功能。南社日记体小说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功不可没，它从政治代名词和政治附庸品的地位中解脱出来，在接近了小说艺术的本性的同时走向了世俗化。南社小说家把晚清小说从崇高政治地位拉回到民间本色，这是中国小说在逐步走向注重艺术性的历史进程中的自然回归。

书信很早就中国文人“论述”的文体。《文选》收书信三十余篇，《文心雕龙》特立“书记篇”来专门陈述书信的源流特征。1915年，包天笑用未亡人给亡夫的11封信连缀成的《冥想》小说，书信体小说正式进入中国小说叙述文场。

苏曼殊、包天笑、周瘦鹃等人，专意于借鉴西方短篇小说的体式、技巧与笔法进行短篇小说创作，为长期封闭、僵固的中国短篇小说注入了新鲜的艺术血液，成为“五四”以后出现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先声。如周瘦鹃的短篇小说《旧恨》，摒弃了传统的叙事方法，描写慧圆师太在七十高龄之际，偶遇昔日情人普陀高僧刘凤来，在四目相对眼光一闪的瞬间“圆寂”，将两人半生的情感恩怨一笔带过。借“偶遇”瞬间之事展开叙述，明显地借鉴了西方文学的典型手法。实际上，结构方式的变化体现的是小说的叙事内涵的变化。小说走出“故事模式”的直接原因在于它不再追求“史传”性的宏大叙事，而转向追求日常性的琐细叙事，南社小说家在叙事构造上完成了中国短篇小说由古典向现代形态的基本转型。

在中国古代，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的小说早就有之，但多局限于“予”“余”的有限视野，所叙之事近似记人事、游历的散文。“中国古代小说缺的